

中国的千年王国

一日三石善吉 著

李遇玫 译



上海三联书店

ZhongGuo de Qiannian

Wangguo

Sanlian Wenku

Haiwai ZhongGuoxue

Yanjiu Xilie

ZhongGuo de Qiannian

Wangguo

· 三联文库 · 海外中国学研究系列

中国的千年王国

一日三石善吉 著

李遇玖 译

上海三联书店

Zhongguo de Qiannian

Wangguo

Sanlian Wenku

Huawai Zhongguoxue

Yanjiu Xilie



K207.8
5026

中国的千年王国 (三联文库·海外中国学研究系列)

著 者/[日]三石善吉

译 者/李遇玫

策 划/陈达凯

特约编辑/张建一

装帧设计/桑吉芳

责任制作/朱美娜

责任校对/辛 然

原出版者/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制 版/上海群众印刷厂

印 刷/上海天华印刷厂

装 订/上海天华印刷厂

版 次/1997年12月第1版

印 次/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50千字

印 张/7.25

印 数/1—7500

ISBN7-5426-1015-5

K·63 定价 11.00 元

138690

致中国读者的序

千年王国的思想属革命的神学。它直接出典于《圣经·启示录》第20章的“与基督共同统治一千年”的千年统治思想，是蕴含着被压迫阶级怨恨的革命神义论。

千年王国的思想，萌发于《旧约圣经》的启示文学。而《旧约圣经》起源于处在奴隶地位的以色列民族的不幸历史中。到了《新约圣经》时代，千年王国的思想者与实践者成为罗马帝政下的初期基督教徒。中世纪后，以德意志农民战争的闵采尔最为典型，那时千年王国的思想已成为被压迫阶级反抗的理论根据。

根据《圣经·启示录》，千年王国思想由以下五部分组成：（一）将现政治权力及政治体制视为恶魔；（二）坚信受恶魔支配的当世将終了；（三）在唯一绝对神的保佑之下；（四）杀尽当世恶魔；（五）迄今为止受压迫的人们将迎来“至福王国”，即黄金般光辉灿烂的巨大都市国家耶路撒冷。

此千年王国的思想与行动的显著特色，在于坚信自己是受唯一绝对神保护的“正义战士”。凡妨碍自己前进的，全部视为“恶魔”。设定在杀尽“恶魔”的“血海”尽头只有“正义者”能生存的“神之国”。

FG76/28

可以认为,这样的思想与行动,只要是在政治权力存在的地方,特别是政治体制极端腐败的专制“危机时代”,必然能被普遍地观察到。这种思想与行动,并不只局限于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框架内,而且存在于巨大世界史的广泛角落。这不仅能从大乘佛教,而且也能从以自我解脱为目标的小乘佛教,从儒教传统强大的中国,乃至日本找到。

最近问世的丹尼尔斯所编的《千年王国世界文献录》,是一部集世界千年王国研究之大成的著作,它对千年王国思想内容作了简洁介绍。全书共有 3700 条之多。此书不限欧美,尚包含了更广范围的研究。从地域看,除欧美外,还有印度、印加、中国、韩国与日本。例如,包括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兴宗教“天理教”、“本道”,以及韩国的“统一教会”、“全能福音中心教会”等的研究。该社同年出版的克莱尔的《历史联系中的千年王国运动》,是又一部令人感兴趣的将千年王国的思想与行动注上历史印迹的著作。

本书论述了在不具一神教传统的儒教中国,也能找到欧美所见的千年王国的思想与行动,并对在中国也能发现的道教的、儒教的、佛教的、基督教的、儒佛道三教混成的千年王国的思想与行动作了论证。如果将中国历史上频发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从千年王国的观点重新考察的话,也许会有与迄今为止的认识所不同的有趣的新发现。新的分析视角赋予运动新的意义,对迄今为止疏漏的现象投上一道新的解释之光。近期,中国学者程歆氏从“劫”的观点立论,出色地展开了对“义和团运动”的论述,虽用语有异,而实质上,论著的着眼点与我的视角(即千年王国的视角)相同。

本书获李遇孜君精心翻译,并经刘琪君悉心校对而成。两

君的勤奋进取精神,令我深受感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两君均是我所熟悉的有思想、有见解、有抱负的中国优秀留学生。借两君的努力,使本书得以译成优美的中文。

在此,还想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黄丽镛教授致以感谢。译著得到了黄先生的全面校阅,并推荐给中国最具权威之一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对于一个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欣喜之情难以言表。若本书的出版能对日中友好添砖加瓦,作为作者,将喜上加喜。

三石善吉

1995年8月于筑波大学研究室

绪 论

本书所收录的黄巾起义(184年)、大乘起义(515年)、太平天国(1851~1864年)、儒教的千年王国思想(1860~1894年)及义和团(1900年)各章,均论及了基督教的终末论,特别是论及了类似于《圣经·启示录》的千年王国思想在儒教中国也能找到。如果我们把《圣经·启示录》的思想核心看作是包含着被压迫者怨恨^[1]的革命神义论,就会发现千年王国运动在有政治权力及被压迫者的地方,不问大洋东西均存在着。在政治舞台上演出的人间悲喜剧,虽具有各国自身的特殊性,却也具有世界的普遍性。正是这种特殊与普遍的辩证法,一方面引起了我们对于各国史(或个人史)的无尽的兴趣,另一方面使我们对于世界史的视野不断扩大。这对有志于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极富魅力。正因为确信这个作为政治思想史的方法概念是极为有效的,所以,想将特殊西欧式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圈的千年王国概念,用于非西欧的中国。根据这个概念,中国政治思想史将以新的视角更加动态地去把握。这是编撰此书的最大动机,也是最大目的。

悠悠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究竟是根据怎样的思想运转的?其思想是一成不变的,或是适应时代不断变化的?众所周知,中

国虽有着不断重复的王朝兴亡的动乱史,但基本上保持着韦伯所说的那种“相信自古以来存在着的秩序与统治权力的神圣性”的传统性支配。秦统一(前 221 年)后,帝国的官僚制化也未能改变这种支配结构。鸦片战争后,受到西方冲击,这个“持续的帝国”(黑格尔语)才渐渐开始变化。以韦伯的家产官僚制概念揭示中国的这种持续与变化,是阐明千年王国思想结构的分析之轴。

据韦伯的学说,传统性支配有以下结构:“命令者为主人;服从者为臣民;行政干部为仆人。”^[2]

居于顶点的是“主人”,这是父亲般的有德的皇帝,作为天之子统治着这块下世的土地。皇帝是神圣的传统(具体是指尧舜孔孟沿承而来的“文”的传统)的继承者和赐福于臣民的福利政策的实行者的化身。传统的继承,福利政策的实行,这两点是家产官僚制国家正统性的依据。由皇帝实行的这种统治,被宣称为德治主义。古圣贤的理念,作为“作用的理想”^[3]覆盖着全帝国。一旦福利政策出现问题,上天便施予灾变给以警告,于是放逐暴君的革命论随之被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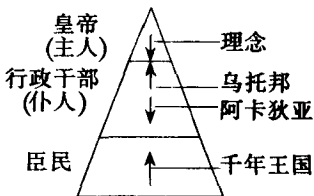
皇帝之下是管理皇帝家产的官僚,即管理全帝国的行政干部。他们是按照西欧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所说的“由健全的贤者而不是多数者决定”,“票数不是算术性的而是以分量衡量”的“优秀决原理”,^[4]即根据通晓显示了古圣贤遗志的四书五经的程度而被选拔出来的知识型精英。他们对科举的最终判定者皇帝,表示个人的忠诚。因此,科举即学问,等于权力,并且这一制度孕育出对于皇帝(居上位者)的恭顺,这是文化帝国独有的精神形态。

在行政干部之下,存在着庞大的从事农工商的一般大众。

他们是被有德的君主、官僚操纵着的政治客体,是被视为因无“学”而无人的品位的愚民。历代王朝的末期所频发的农民反抗,便是作为愚民的人们恢复其品位的运动。而这个运动的根底,充满着被压迫者的令人恐惧的怨恨。

在以这样的家产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性支配之下,怎样的愿望形态是可能的呢?本书将对中国的千年王国作详述,但除此之外,也存在着乌托邦、阿卡狄亚的愿望形态。^[5]乌托邦是以莫尔的《乌托邦》为原型,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不满,具有基于理想国家论、静态性、划一性、母性原理之上的辉煌都市等特征。视觉上令人联想莫尔所描绘的乌托邦岛。阿卡狄亚是以古罗马诗人弗吉尔的《牧歌》为原型,具有知识分子对体制的批判、田园之美、人的质朴、无政治性、虚构性、牧歌式的黄金时代等特征。以视觉艺术为例,普桑的《阿卡狄亚的牧人们》、大雅的《十便贴》、芜村的《十宣贴》等被联想。千年王国能够概括为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论,与乌托邦、阿卡狄亚完全不同,是超越常规的辉煌黄金都市(《圣经·启示录》中的新耶路撒冷),或者是无比富饶的乡村《洋点心之国》,如勃鲁盖尔所描绘的《幸福岛》。

千年王国、乌托邦、阿卡狄亚,这三种愿望形态,从其思想的肩负者、运动的主体、所表明思想内容等观点看,如图所示,可与传统性的支配结构(主人、仆人、臣民)互相对应。首先,千年王国是被压迫人民反抗的教义,是革命的神义论。黄巾起义、大乘起义、太平天国为其典型。儒教的千年王国和义和团,是对西欧列强侵略中国(由此,中国自身成为被压迫者存在)的抵抗。图



中,千年王国的箭头朝上,黄巾、大乘、太平天国,表示着臣民的反抗和革命力量直接指向统治阶级。而在中国自身成为被压迫者存在的儒教的千年王国和义和团,或为举国性的排外运动,或为政治改良论。中间的仆人层的某些行政干部知识型精英,一部分对政治、社会、宫廷、官僚、人世间种种的腐败堕落,持批判否定的态度;一部分从现实政治脱身,投入超脱的诗的境界,极尽赞美田园、自然、非政治世界。中图指向底边的箭头,是表示知识分子同现实政治及权力的脱离,即为追求非政治价值的阿卡狄亚谱系。而指向顶点的箭头,是表示部分知识分子将君主、官僚所行的现实政治对照应具的理想理念,对堕落、腐败、恶化的现状深为不满,向安于现状、忘却理想的为政者们指出应循的理念,(侥幸地)期待着来自君主的政治改革,即为追求政治性价值的乌托邦谱系。最后,对应于顶点的主人的思想,表示统治的应有形态,即理念。具体说,在中国是指古帝王古圣贤尧舜禹孔孟经实践倡导而来的理想的统治方法。

概括地说,中国古代的传统性支配体制以“文”为基础,大体可分为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若根据托马斯·曼与梅内克的学说,称其为文化帝国(参照第五章)。这个文化帝国,即为对文化圣人留下的四书五经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作权威性的分配,并借此维护帝国秩序的全体家产官僚制国家。居于顶点的皇帝,在秦汉帝国,特别是在宋代以后,作为天与传统的继承者,标榜“德治”,炫耀其正统性。官僚作为皇帝的家产管理者和“文”的继承者,带领百姓将古圣贤的德治实现于今。这就是支配的理念。可以认为,由于华北旱地农业与华南稻作农业的高度发达,^[6]知识型精英对于“文”传统的全心全意的信赖,以及万里长城之内帝国的彻底和平化诸主要因素的综合,这个中国的文化

理念得以保持住惊人的持续性。但是,学问等于权力的精英所产生的特异性,培育了对皇帝的恭顺、学问的功利性及怨恨。其结果,是对人民的残酷掠夺。臣民不被看作人,只被当作掠夺的对象。于是,在王朝衰退期,民众暴动频发,“易姓革命”(传统革命)兴起。

黄巾起义时代,是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期。在儒教思想大体确定了其正统性的后汉帝国末期,非正统的道家思想摄取了由刺激传播^[7]而传来的佛教教义(特别是来世的拯救思想)。安于现世享乐的汉民族受到来世拯救思想的剧烈冲击,产生了尖锐否定现世——因天灾人祸而造成可怕的社会性混乱时代——的太平道思想。新传来的思想给予了批判现实政治状况的新观点。于是,道家思想在此与佛教、黄老思想混成,作为新的道教思想再生。黄巾起义不仅作为刚形成、尚未被冠以“道教”名称的道教最初期的大规模民众起义值得注意,而且由否定现在——天地大终——→太平的这一思想结构,与《圣经·启示录》中特征显见的千年王国思想结构完全一致,也极为引人瞩目。因此取谢纳之说,称之为道教的千年王国,以此把握其初源形态。

黄巾起义中,我们所熟悉的董卓、曹操、刘备及孙权等《三国志》主角纷纷登场。但从千年王国的视角重新把握黄巾起义的话,反叛的主谋张角,才是改造世界的救世主。而曹操只是压制救世运动的反面角色,刘备、关羽、张飞也不例外。汉王朝被看作是造成乱世,并想镇压救世运动的压迫机构。这个观点也是正面肯定从农民起义中发展而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史所具有的农民革命性质的观点。但从千年王国的视角重新把握的话,一个不局限于教条,更为广泛自由地对历史进行理解的世界将为之展现。

大乘起义的时代,是包含正法灭思想的大乘佛教经典刚在中国传播的时期。从印度、西域传来的《大般涅槃经》(421年汉译,以下简称《涅槃经》),宣扬了拿起武器进行护法圣战的新思想,与原有的弥勒信仰结合,鼓吹“杀一人者为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以杀人作为修行的阶梯,产生出恐怕在佛教是不能想象的极端好战的宗教起义。诚然,这里所杀的是指佛法的迫害者,故他们决不是肆意屠杀的刽子手。无论如何,因为是根据弥勒信仰与《涅槃经》而产生的反叛,应称其为弥勒涅槃的千年王国,简称弥勒千年王国。

在历史的终末进行善与恶的决战这个思想起源于伊朗。一方面,被佛教摄取为《涅槃经》中的护法圣战论;另一方面,成为犹太教及《圣经·启示录》中哈米吉多顿^[8]的最后决战的思想。但是,佛教是基于母性原理的世界宗教,从后来日本镰仓时代的亲鸾在文章中引用《涅槃经》宣扬恶人成佛之中可以理解,并非要杀死恶人而是要给予灵魂的拯救。恶人正因为恶才要给予拯救的思想,是大乘佛教经典《涅槃经》中的强调之处。《涅槃经》完全没有把从伊朗思想中导入的护法圣战论置于教义的中心(见《涅槃经·金刚身品》)。与此相反,因犹太基督教的宗教基于的是彻底的父性原理,故强调除恶务尽,然后设定一个理想社会。《圣经·启示录》中的千年王国与新耶路撒冷都是在当世的丑恶彻底消灭后才出现。这就是基于父性原理的宗教所固有的、可怕的内在暴力契机。《涅槃经》的刺激传播导入了来自伊朗的这个基于父性原理的思想,但印度和中国的独立性极强,故不能将《涅槃经》看作是受了起源于伊朗的宗教(摩尼教与拜火教)的直接影响。隋、唐以后的民众造反,大多与这个弥勒千年王国有关,元末的红巾起义(1351~1366年),明代的徐鸿儒起

义(1622年),清朝中期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4年),均是显著的例子。

但是,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直接从基督教的传教书中发现了千年王国思想。1833年春,十九岁的洪秀全因科举赴广州,从街头布教的传教士处得到传道书《劝世良言》。^[9]据说,这个传教士叫梁发,是中国人中最早的一个基督教传教士。他来自广东全省的赴京考生中物色合适人物,赠送此书。洪秀全对书中万物的创造主耶和華因怒于人类的堕落而引发洪水毁灭所多玛、蛾摩拉之城,并举行最后审判等记述不寒而栗。从这本书中,洪秀全完全独立地发现了“世界堕落→最后决战→最后审判→新耶路撒冷”这样一个终末论结构,即千年王国思想。洪秀全在此找到了补偿自身因多次科举落第而其价值被剥夺的出路。

洪秀全的千年王国思想的形成极富个人色彩。但这个反抗的思想逐渐带上泛社会意义而最终成为广大民众造反的理由,则是因为它代为表达了民众对鸦片战争后西欧侵略扩张而引起的政治社会状况的恶化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太平天国把千年王国论、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及中国古来的太平世思想作为武器,对基于恭顺原理与精英主义的清朝统治发起正面挑战。如同黄巾起义、大乘起义都发生在初期佛教及大乘《涅槃经》的传播期一样,太平天国也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与西欧接触,特别是基督教开始在民众层次传教的广泛接触期(顺便提一下,基督教的中国传道高潮约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明末清初耶稣会自上而下的,即来自教皇的改宗式的布教战略时代;二是鸦片战争后新教的自下而上的民众的布教时代;三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欧美兴起的基督教信仰复兴运动期)。新思想的传播,赋予了观察社会的

新视角,酝酿成新型的造反。这样,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具有双面神的性格:一方面具有古老的宗教造反的特色;另一方面具有与尚未到来的革命相连接的新面孔。

清朝末期还曾有过以下的思想潮流。在列强露骨侵略中国的19世纪70年代的香港、上海,此思想潮流首先借王韬之笔在中国思想界登场,成形于1894年春中日战争前夕陈炽的《庸书》,中日战争前后涌现出其继承者何启、胡礼垣,但终因严复、梁启超的进化论的出现而戏剧性地消失了。

此思潮的最大特征是具有“唐虞三代的理想之治→秦以后的堕落→当今的一代变局→君民民主之治→大同(大一统)”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思想。把当今看做一大变局的时代认识的基础,是在于痛感到了列强的侵略、中国的腐败及亡国的危机。此思想认为:尧舜夏殷周的理想之治(光明时代)至秦蜕变,当今更为堕落的时代(黑暗时代)仍在继续。宋代未见儒教的中兴,朱子亦不被尊重。此思想根据道(中国的精神文化,即孔教)、器(西洋的制度技术)二分法的道器论和中体西用论,在引入据认为是因秦的焚书坑儒而西传的中国原产的“器”时毫不踌躇,且把西洋的政治制度如议会制也作为中国的原产物考虑,将此一并引入,以实现“上下一德”的君民民主之制,强化中国国家。在他们的议院论中,甚至连显而易见的民权论也被认可。规定以中国的道,即孔教为核心的终极的理想国家为大同(大一统),构想以儒教思想统一全世界。

此外,这个思想在薛福成、汤寿潜、陈虬那里也能见到,在郑观应、邵作舟的思想中也依稀可见。他们的思想从国内政治看,具有拥护强化体制的机能。但作为思想主体的意识,仅仅是对付列强侵略的祖国防卫论。无论如何,持有上述结构的思想与

犹太基督教的千年王国标志几乎完全一致。^[10]因其在根本上对儒教孔教持忠诚信仰,所以称其为儒教的千年王国。这个思想假设汉儒的“西往”,轻视朱子学。因为它对历史的理解过于单纯化,在进化论登场后即迅速地消失了。但在传统主义——→开明的传统主义——→儒教的千年王国——→近代的保守主义这样展开的晚清思想史中,它是准备了随其之后的近代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潮流。

儒教的千年王国思想正在要结束其历史使命时,巨大的民众排外运动爆发了,即义和团运动。1898年左右,以山东为中心,习拳的民众兴起了反洋鬼子、反基督教的运动。清朝给予支持,1900年6月21日,向列强宣战,经“北京五十五日”,1900年8月14日,联军进入北京,1901年9月7日,以辛丑条约的签字而终结。此事件的政治思想史特征是:以清朝朝廷从三元里以来的“以民制夷”政策为前提,加之有势力的地方督抚张之洞所代表的排斥“民权”、独尊“国权”的国防论,及接受此论的地方乡绅更为狂热的攘夷论,并综合“真正义和团”的道教的千年王国和白莲教的佛教的千年王国等诸要素,成为卷入社会最底层人民的文化帝国的最后的巨大的国家性、民众性排外运动。

义和团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确实呈现了举国一致的祖国防卫战态势。但,这不能说是近代性的民族主义。首先,“以民制夷”的战略及张之洞的“国权”论,均是以彻头彻尾的愚民观为支柱。而且,地方乡绅的排外论也是基于陈腐的攘夷论。此外,道教的千年王国、佛教的千年王国也都是传统的宗教造反、农民造反的理论,均缺乏国民等于国家的民族主义的特征。为填肚子奔教会的,被蔑称为混饭教徒的反义和团成员们,鉴于有着“在天主教的日子都不错”的体验,谈不上爱乡土与爱祖国连接

在一起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义和团的研究工作上,也有必要不从基督教的观点而是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着手,以这些混饭教徒为焦点,做实质性的研究。

注释

[1] 韦伯从尼采的著作(如《道德的谱系》,岩波文库,36页起)中吸取了怨恨说及其阶级归属性论,但认为“苦难的神义论”未必是“被压迫社会阶级所产”(《宗教社会学论选》,三铃书房,50页)。这里将其作为家产官僚制国家中国的“奴隶反叛”理论,想重视怨恨说的作用。又,有关韦伯和尼采的问题,参照内田芳明的《韦伯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岩波书店,1968年)。

[2] 韦伯:《支配的社会学》第一册(世良晃志郎译,创文社,1965年),39页。

[3] 有关“作用的理想”,见林德赛的《现代民主主义国家》(纪藤信义译,未来社,1969年),58页起。

[4] 町田实秀:《多数决原理的研究》(有斐阁,1968年),21页。

[5] 莫尔:《乌托邦》。关于阿卡狄亚,见涅尔的《精神的发现》。托尔斯泰与甘地主张并实践的非暴力论,可与千年王国对照。

[6] 西山武一:《亚洲的农法与农业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94、105页。

[7] 刺激传播是指接受方以独创性为主,即非单纯模仿。因此《涅槃经·金刚身品》的“护法圣战”论,被认为是信徒独立创造发展来的思想。见山本新:《汤因比和文明论的焦点》(劲草书房,1969年),325页起。谢纳:《东洋平等主义与乌托邦传统》(《狄奥盖乃斯》日本版第五号,1971年3月,河出书房新社)。

[8] 哈米吉多顿通常译成“最后的决战(场)”。见《圣经·启示录》16章16节。本文序章将详述。

[9] 《劝世良言》得到的经过,参照亨巴格的《洪秀全的梦幻》(青木富太郎译,生活社,1941年)以及市古宙三的《洪秀全的梦幻》(汲古书院,1989年)。简言之,从事街头布教活动的传教士以“使你们如愿”的宣传引诱,洪秀全想知道自己的愿望(科举及第)是否得以实现,遂接近传教士。这里,亨巴格并未提及会话内容。翌日,洪与传教士再次会面,并获得9卷本《劝世良言》。

[10] 《圣经·启示录》的标志与儒教千年王国的特征,这两者的对应关系如下:(1)制度的瓦解——大变局;(2)压迫阶级——被压迫的中国;(3)组织化——著作活动;(4)绝对者——尧舜孔孟;(5)圣战——孔教的世界称霸;(6)光明——黑暗——光明时代——三代之治——秦之后的堕落——大同;(7)理想国家——大同(大一统)。以上(1)、(2)、(4)、(6)、(7)完全对应,(3)、(5)显示了质上的略微不同的对应关系。儒教的千年王国理论因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论,故未取大众动员和组织化的方式。又,儒教的千年王国虽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但其中心问题是国家之间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故未构想发动战争征服,孔教的世界称霸是指在大同世中由孔教实行世界一元化。